

祖国的四川



五四运动与四川建党

温 贤 美 邓 寿 民

四川人民出版社

祖国的四川丛书

五四运动与四川建党

温贤美 邓寿明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1079845

责任编辑：蒲其元
封面设计：刘运勇
技术设计：凌志云

五四运动与四川建党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宜宾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5 插页1 字数41千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书号：11118·213 定价：0.50元

编 者 的 话

《祖国的四川》丛书，是一套介绍四川历史文化普及性知识读物。本丛书的选题，主要是从各个方面介绍四川悠久的历史、壮丽的山川、灿烂的文化、宏伟的建设、丰富的物产、杰出的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英勇的革命斗争……等等。如果读者能通过这些介绍，对四川地区的古今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从故乡的发展变化中受到鼓舞，焕发出强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积极投入四化建设，为建设家乡、振兴中华而奋斗，那就是我们的最大愿望。

本丛书在编写上，力求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史实准确、文字生动、篇幅短小、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今后，按读者的需要，我们将在出版单行本的基础上，再出版专题合订本。

目 录

一、五四运动前的四川概况	(2)
二、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发展	(10)
1.五四运动的爆发.....	(10)
2.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发展.....	(17)
三、新文化运动在四川的发展	(30)
四、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	(38)
五、党团组织在工农群众斗争中 建立和发展	(51)
1.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党支部的建立.....	(51)
2.党中央特派员来川指导工作.....	(58)
3.党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62)
六、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的诞生	(71)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运动，史称“五四运动”。它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地席卷了全国。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了历史舞台，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性质和作用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①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发展，也是这样。它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五年冬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的成立，促进了四川的革命运动。那末，五四运动在四川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它怎样准备了四川党的建立？让我们分别从下面几个方面来阐述吧。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二——六九三页，竖排本。

一 五四运动前的四川概况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五四运动前，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已冲破夔门关，深入到巴山蜀水间，使四川也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侵入四川，首先是从宗教侵略开始的。一八五八年六月，英、美、法三国政府强迫清朝政府分别订立了《天津条约》，规定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从此，各国传教士纷纷涌入四川。他们在重庆、成都、万县、宜宾、达县、南充、雅安，甚至边远城乡，勾结官府，霸占土地，设教堂，立教会，欺压群众，蛊惑人心，走私犯禁，干预行政，形同地方上的太上皇。

由于教会的种种暴行，多次激起群众反洋教的斗争。自一八六三年第一次重庆教案以来，四川各地人民反帝斗争，此起彼伏。一八九八年，大足县余栋臣率领群众进行反洋教的武装起义，曾攻打重庆、永川、内江、安岳等地，影响及于三十多州县，烧毁教

堂二十余处。一九〇〇年前后四川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对教会的暴行又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捣毁川中三十多州县的教堂，惩罚不法教徒数千名。但因教会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强迫清政府赔偿教会的损失。“从一八六三年第一次重庆教案起，迄至一八九八年大足教案止，各国教士从四川诈取的赔款，综计有三、四百万两银子，六倍于四川一年田赋收入。”^①教会得此巨额赔款又迅速恢复、发展，传教士也不断增加。“根据一九〇九年四川九十九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从一八六三年到一九〇九年四十余年中，法、英、美、德等国派到四川的传教士达五百一十五名，其中一九〇一—一九〇九年的九年，比一八八五—一九〇〇年的十五年，英国传教士增加百分之六十，美国增加一倍。”^②这些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为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侵略活动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的先遣队。

继宗教侵略之后，帝国主义的商船和军舰又开进了川江。一八九〇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后，重庆正式开为同外国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国家

①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第13页。

②同上书，第3页。

根据不平等条约窃有的“内河航行权”，直把商船和军舰从长江口一直开到万县、重庆，并上溯到宜宾。川江上航行的几十艘轮船，除有几艘是中国招商局的外，其他全为英国的太古公司、怡和公司以及日本的日清公司和美国的大来公司所有，几乎垄断了川江的进出口运输。外国资本家把大批商品，如棉纱、布匹、煤油、五金、纸烟，甚至连琐细的洋针、洋线、牙粉、牙刷、毛巾、纽扣、花纸和普通文具等商品都运进四川，然后通过买办商人销往各地；又大量收购黄丝、桐油、猪鬃、药材、皮革等土特产品，牟取暴利。这样，就侵夺了四川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严重打击了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许多民族资本家开的工厂和出售国货的商店大批倒闭，手工业者大量破产，而帝国主义的洋行、公司、工厂却在万县、重庆等地大批兴建起来。如美国的花旗银行、美丰银行，英国的摩根煤铁公司，以及日本的又新丝厂、江津火柴厂等，都象一根根吸血管插入四川的肌体中。到五四运动前夕，重庆的外国洋行已达十三家，其中日本洋行占六家，倾销日本商品多达五百多种。帝国主义已把重庆变成了在四川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输出资本的重要基地。^①

^①参见杨付军：《五四运动在重庆》，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

英、法、日、美、德等国为了“开拓”它们在四川的侵略事业，一八九〇年以后，都相继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成都不是通商口岸，英、日、德三国也设有领事馆。这些领事馆都享有所谓“治外法权”。一九〇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强索重庆南岸王家沱作为租界。日本在租界内享有实施行政，设立警察，出租土地，修建工厂、码头和道路等权利，租界简直成了“蜀中之国”。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国家还根据《辛丑条约》中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以付“庚子赔款”的规定，侵夺了四川每年的关税和盐税。因此，重庆海关和自流井盐务稽核所的实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四川每年只能提取一点扣除赔款后的余款，叫做“关余”和“盐余”；四川的邮政权也操纵在外国人手里，成都的邮政总办就是外国人。他还常坐着四人大轿，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摆出一副殖民者的臭架子，令人愤恨。显然，四川的主权已是不完整的了。

以上情况表明，四川已经变成为半殖民地了，四川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了。

另一方面，四川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也很突出，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非常激烈。

辛亥革命后，四川虽然也结束了清王朝的反动统

治，但政权仍然落在封建地主阶级手里。大小军阀，割据称雄，连年混战。

一九一二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中诞生的政权，当了“临时大总统”，革命遂遭失败。四川同全国一样，革命党人被排挤出军政机关，而依附于北洋军阀的胡景伊被袁世凯任为四川都督，统治着四川人民。一九一三年全国兴起“讨袁之役”，四川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参加讨袁斗争。熊克武率部分军队在重庆宣布独立，组成讨袁军，由重庆分两路攻成都，初获胜，后失败。

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十一月，他就非法下令解散国民党，一脚踢开国会。四川都督胡景伊也按袁世凯的旨意，把两院中的革命党人悉行勒令解职。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又派其亲信陈宦督理四川军务，主持川政。陈宦积极拥袁称帝。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蔡锷等随即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国运动。一九一六年，护国军四川招讨使熊克武，率领川军配合蔡锷自云南率领入川的讨袁军，赶走了袁世凯调进四川的北洋军队和他的党羽陈宦。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熊克武又率领部分川军，响应孙中山“拥护约法”的号召，

组成靖国军，并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率军进行护法战争，打败了段祺瑞派遣入川的北洋军队，赶走了倒向北京政府的四川军阀刘存厚。这是两次在政治上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战争。除此以外，都是川军与滇、黔军，以及川军内部派系间的混战。在军阀混战中，人民深受其苦。

一九一八年川战暂时停息，广州大元帅府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省长。同时，北京军阀政府仍继续对四川行使权力，支持刘存厚、杨森等四川军阀，并任命省里的一些官员。四川正处在南北两大政治势力的争夺中。

四川人民除受军阀混战之苦外，还要承担反动政府沉重的苛捐杂税。“一九一三年后，苛捐杂税遍地兴起，有烟草捐、租石捐、蚕捐、小猪捐、娱乐捐、戒烟捐、轿铺捐等九十几种，成都省会警察厅的杂捐有二十四种，其中包括雇婢、置妾、妓女从良等项目。一九一七年后，各部队又开始就地预征、借垫、临时筹垫；地方武装团保也自筹经费，敲诈勒索。”^①

农民除了负担苛捐杂税外，还要受封建地租的残酷剥削。地租一般都很高：上等田二八分或三七分，

^① 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870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等田四六分，下等田对半分。就是说，地主要分得田地收获物的五成至八成，农民辛劳一年只能分得收获物的二成至五成。有的交不够地租，还得忍受高利贷的剥削，借债交租，因此，农民日益贫困，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苦难生活。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流入城市做苦力；或吃粮当兵；或参加红灯教等组织，啸聚山寨，反抗洋教和官府，打杀土豪劣绅。

在清末民初，四川的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发展很缓慢。鸦片战争后，虽然商品经济已有所发展，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生产力水平低。到洋务运动后，四川才有几家官办的工厂，如兵工厂、造币厂、机械局、铜元局采用较大型的机器生产，而民营的工厂，如缫丝、制革、印刷、火柴等厂，只是部分使用机器生产。由于帝国主义大量倾销商品，进行经济侵略，不少民营工厂和商店破了产，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它们的商品难于运来中国倾销，四川的民族工商业才得到了短暂的发展机会，工厂逐渐增加。例如：“到一九一五年，重庆使用铁机进行生产的缫丝厂已增加到十一家，制革业增加到七家，染织厂增加到三家，其他各行各业都有

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商界也出现了号称百万富翁的巨商。”^①这样，由于四川工商业有所发展，就壮大了职工队伍，从而为四川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参加五四运动，以及党的建设准备了条件。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四川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深感时代的压抑和内心的痛苦，在他们中所蕴积着的斗争怒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们要求打破现状，追求光明，振兴中华。这也是整个社会的、民族的共同愿望。

^①杨付军：《五四运动在重庆》，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

二 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发展

1. 五四运动的爆发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为什么于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爆发？这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夜，中国正处在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期。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使用阴谋手段，于一九一二年三月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一九一三年十月又被“选”为“正式大总统”。中国仍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买办阶级所统治。一九一四年，爆发了“同盟国”（德、奥、匈）和“协约国”（先是英、法、俄三国参加，美、日、意等国后参加）之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日本利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力顾及中国的机会，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也对德国宣战，随即派兵攻占了原为德国占领的我国山东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取代了德国在山东范围内的各项权益，在它侵略

中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占全中国，又令驻华公使日置益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秘密条款，共有五号，其主要内容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增加新的特权；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部蒙古有居住、经商、拥有土地、筑路、开矿等特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中国政府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等部门须聘用日人当顾问，并允许日本在福建、江西、广东等省有筑路、开矿等权利。袁世凯为得到日本支持，派出代表和日本代表谈判。日本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袁世凯为了急于换取日本支持他当皇帝，竟于五月九日答复日方，除对第五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于是，全国大哗，坚决反对袁世凯卖国投降，反对“二十一条”！从此，全国人民把五月九日这天作为国耻纪念日，把直接负责办理“二十一条”谈判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人视作最可恨的卖国贼。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悍然宣布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开始使用皇帝的

称号，并把次年作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对。在全国一片唾骂和讨伐声中，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随即忧惧成疾，于同年六月六日死去。这就表明违背民意、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野心家、卖国贼，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反革命衣钵，仍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这时，日本在与英、法、俄等国达成秘密谅解协议的情况下，怂恿段祺瑞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段祺瑞政府对德、奥宣战后，不仅未提出收回德国原占的山东权益，而且进一步向日本出卖山东权益，以换取向日本大量借款，维持其反动的军阀统治。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匈“同盟国”的失败宣告结束。

一九一九年一月，胜利了的“协约国”英、法、俄、美、日、意等国的代表开始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这个和会实际上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会议。会议经过长期激烈争论，开到六月底结束。中国在大战中参加了“协约国”方面作战，这次